

# 哲学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张宁宁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原则, 对理解的历史性与有意误读和视阈融合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解析, 可以解释翻译过程中理解产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理解和解释是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 是解释者与被解释客体产生视阈融合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同时也具有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等特点。

**关键词:** 阐释学; 翻译的历史性; 视阈融合

**中图分类号:** H0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77-05

阐释学 (hermeneutics, 又译为解释学、释义学、诠释学等) 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经历了从赫德 (J Herder)、施莱尔马赫 (F E D Schleiermacher)、狄尔泰 (W C L Dilthey)、海德格尔 (M Heidegger), 到当代的伽达默尔 (H Gadamer)、利科 (P Ricoeur) 等人的全力阐发, 阐释学逐渐走向成熟, 成为当今诸多“后”学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阐释学方法也成为一种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拟运用伽达默尔 (Gadamer) 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阈融合”哲学解释学原则, 结合翻译中有误读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去解释翻译过程中理解产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

## 一、理解的历史性与有意误读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 (Verstehen) 是历史的, 理解的历史性 (Geschichtlichkeit) 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 (Vorurteil), 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sup>[1]380</sup>。历史性是人存在的基本前提, 是无法消除或抹杀的。人是历史的存在, 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 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sup>[2]</sup>。任何人在进入阐释过程时都不是如同一块白板, 他肯定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和道德伦理等进入阐释过程中去。例如对哈姆雷特的一段著名独白, 梁实秋、曹未风、朱生豪、孙大雨、卞之琳、林同济和王佐良均有过翻译, 如下所示: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梁: 以及一切凡夫俗子所能加给善良人的欺凌

曹: 以及穷人所忍受的, 而且被称为美德的那种拳打脚踢

收稿日期: 2007-10-25

作者简介: 张宁宁 (1983-), 女, 河南焦作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英语对比与翻译

朱: 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孙: 以及那耐心而有德之辈所遭受的卑劣者的侮辱

卞: 做埋头苦干的大才, 受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出去

林: 劳苦功高反而遭到了小丑们的诅咒

王: 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忍耐不学无术之人对他所施的蛮横无礼的待遇

同样一段文字, 由于语言之间差距的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对译者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译者自身的个人经历、性格、水平和好恶等各方面因素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译者对原作的阐释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原意, 有时可对原作的意义做出若干种解释。因此译文也相应地带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例如对于 *merit* 和 *unworthy*, 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不同的内涵和定义, 具体为“善人、美德、辛勤、有德之辈、埋头苦干的大才、劳苦功高、真才实学”, 与之相应的是“凡夫俗子、穷人、小人、卑劣者、小人、小丑、不学无术”, 这就是由于处于历史存在中的阐释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所致。伽达默尔承认“前理解”的合法性和在阐释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 “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 因为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sup>[1]380</sup> 而理解的历史性暗示了文本意义多元理解的可能, 文本释义开始向读者开放。譬如, 同样是译拜伦的诗, 梁启超用的是元曲体, 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 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 而胡适则用离骚体。不同的诗体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塑造出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形象<sup>[3]146</sup>。伽达默尔认为: “一部作品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意旨, 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时间的推移中必然在同一部作品中获得不同的启示。”<sup>[1]380</sup> 这同样也说明作者把文本的绝对阐释权转让给读者, 文本终极意义不复存在。

伽达默尔反对所谓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科学客观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永不置身于其中而加以客观研究的对象。在伽达默尔看来, 理解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 根本就无所谓历史的真面目, 理解者总是带有自己的偏见, 并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 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 并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 实际上, 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 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sup>[1]262</sup>。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 是解释者对处身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鲁迅断言: “(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了《易》, 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sup>[4]</sup>这一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方法。

对同一部文学作品, 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理解和解释。由于理解的历史性、阐释者前理解的存在, 误读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勒费维尔曾言,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无论哪一位译者, 都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 绝对“忠实”的译文是不可能存在的<sup>[5]</sup>。并且, 历史性误读是时代认可的理解, 是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价值观等影响的产物。例如晚清时期, 面对列强入侵和外族统治, 当时的文人志士充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 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 在译介到中国时, 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导向”, 肩负起了政治任务。中国译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所译的《哈姆雷特》, 与西方译者从 Freud 的心理分析角度所译的 *Hamlet* 各具创造力; 而英国 Routledge 和 Kegan Paul 出版社出的由 Clement Egerton 翻译的《金瓶梅》, 读来更是一部经过再创造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

的偏见，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译文与原著关系如同一条切线与一圆周相交。译文与原著轻轻地一碰而过，其意思随后顺其自己的方向，在译文语言的‘语言流’中无限地延伸漂泊。”<sup>[6]</sup>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注定要成为一新事物，成为文化和语言大潮里波动的一刻<sup>[2]</sup>。

## 二、视阈融合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本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是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文本和阐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阈”(horizon)，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本文，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努力。伽达默尔对认为“视阈概念在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阈就是看得见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sup>[1]380</sup> 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阈，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阈。两种视阈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sup>[2]</sup>。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阐释者与客观物两者的视阈融合到一起，达到“视阈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阈，达到一个全新的视阈<sup>[1]380</sup>。对翻译研究而言，视阈融合观充分解释了文本意义产生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使自己的视阈与源语文本视阈互相发生融合形成新视阈，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将新视阈重新固定下来并形成翻译文本的过程<sup>[7]</sup>。

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阈”<sup>[1]271</sup>。事实上，视阈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固定下来。理解者和文本固然都有各自的视阈，但理解并不是像传统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阈而置身于异己的视界。两者视阈多数情况下互相碰撞、排斥，视阈融合的过程也是视阈碰撞的过程，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从极端的角度讲，视阈冲突有可能产生以一种视阈完全代替另一种视阈而产生完全彻底的归化式或异化式的文本。视阈的冲突若无法调和必然导致文化过滤，对异质文化改头换面，以适应本土文化的规范，即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源语文本进行创造性叛逆<sup>[8]</sup>。

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可见，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的主体性在“视阈融合”概念下显得尤其突出。许渊冲说，文学翻译是艺术……，科学研究是 $1+1=2$ ； $3-2=1$ ；艺术研究的是 $1+1=3$ ； $3-2=2$ ；因为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还要译味<sup>[9]</sup>。所以，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在解读文学这门“艺术”时，也不是一台简单复制模仿的“翻译机器”，因为两种“视阈”的融合不可能达到全方位的契合，翻译过程亦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因而“ $1+1=3$ ； $3-2=2$ ”正是译者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进行创造性叛逆的结果。

在实际翻译中，一旦一部作品的传播跨越了时代、地理和民族，该作品的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就会更加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这部作品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

化的交流和碰撞,误解和误释。杨巨源有首诗名《城东早春》,诗曰“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英国汉学家翟理斯<sup>[10]</sup>(Herbert A Giles)把它译作:“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 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That beautiful embroidery the days of summer yield, appeals to every bumpkin who may take his walks a field.”有人指出 early May 译原诗中的“新春”不符合中国时序景物,属翻译处理不当。但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译者对中文原诗的把握很严谨,基本上传达了原始的诗意和意境。用 early May 译作“新春”是出于押韵的需要,与第二句中的 willow spray 押韵,并且对于英美读者来说,early May 已经包含“新春”的信息,简单明白。译者是历史的存在物,拥有在现今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阈,而文本本身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阈,并且两种视阈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因而它们互相碰撞,相互排斥并最终形成视阈融合。在这里,传统理论认为译者可以穷尽文本意义的认识得到了消解,译者作为有自己独特“视阈”的解释者,在与文本“视阈”对话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地位。另外,在翻译原诗时,译者通过创造性叛逆更生动地表达了本族文化特色。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一个原作者原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sup>[3][14]</sup>

### 三、结 论

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而合法的偏见是进行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对话事件。通过阅读,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形成一种问答模式的对话关系。在问与答的循环中,文本向理解者敞开,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有的视阈,从而达到“视阈融合”<sup>[11]</sup>。文本的意义就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中通过双方视阈的融合而得以敞开。读者从敞开的文本中初步了解了文本所描述的对象,并赋予文本新的经验和新的解释。因而,文本的意义无法一劳永逸地获得,更不具有绝对性和客观性。文本的意义在解释学循环中不断生成、更新,处于多元的无限可能性之中。

#### 参考文献

- [1]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2] 张德让.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1, 22(4): 23-25.
- [3]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45.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M].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1992: 32.
- [6]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J]. 曹明伦, 译. 中国比较文学, 1999, (1): 71-78.
- [7] 朱健平. 翻译即解释: 对翻译的重新界定: 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9(2): 69-74.
- [8] 耿强. 阐释学翻译研究反思[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22(2): 77-82.
- [9] 许渊冲. 文学翻译: 1+1=3 [J]. 外国语, 1990, (1): 6-10.
- [10] Giles H 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05: 405.
- [11] 刘云虹. 解释的合理性: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5): 55-57.

##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ZHANG Ningn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200237)

**Abstract:** H Gadamer puts forward two principle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fusion of horizons. This paper, connecting these principles with misunderstanding and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employ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It holds tha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pre-understand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interpreter and object make fusion of horizons continuously. It also puts some emphasis on the open meaning of a text and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Hermeneutic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usion of horizons

(编辑：周斌)